



走过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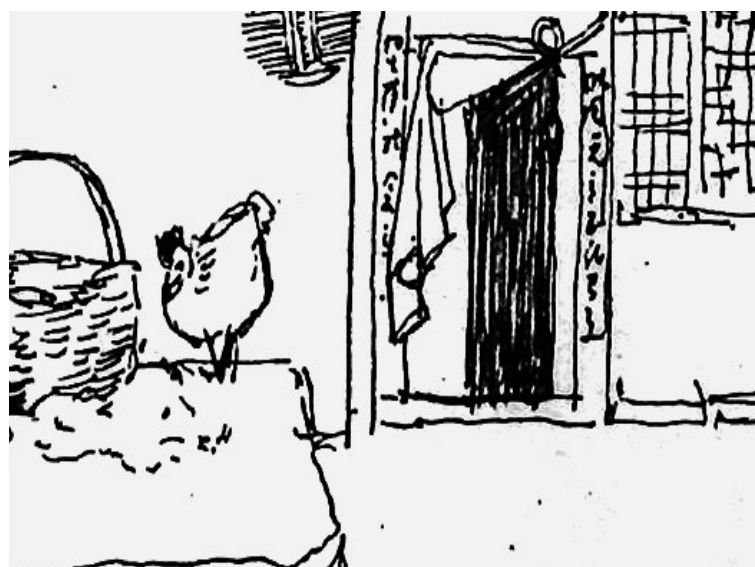
邢仪眼中的陕北



● 刨洋芋



● 集体劳动



● 农家小院



● 女孩与小鸡

难忘延安窑洞前的一次演出

王小娅

在延安插队时，每天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挑水做饭，忙得不亦乐乎。虽然很累，但年轻的我们不甘寂寞，晚上常常坐在炕上，有的学唱歌，有的学拉琴，热闹又开心。不曾想，炕头学的歌曲有一天也派上了用场。

我们知青曾经配合生产队组织过一次文艺晚会，我参加了这场晚会。那是我头一回登台表演，以至几十年过去了，演出时的一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年，生产大队组织召开大会。这次大会与往常不同，除了队长、书记讲话，还有文艺演出。地点就在知青窑洞前那片开阔的地方。队里号召大家积极报名参加。于是，我们知青策划组织了那次晚会。

我们知青商定出演表演唱节目《五好红花寄回家》，该节目围绕全家老少送小伙子参军这个主题，边唱歌边表演，活泼有趣，生活气息十足。

表演由张亚英和于瑛两位大姐负责，由靳宪华出演参军的小伙子，李爽如扮演爸爸，金兆敏扮演妈妈，张亚英扮演姐姐，我和邓卫新扮演妹妹。

演出时，两根竹竿撑起一块红布，当作幕布。窑洞里的灯泡拉出来挂在窑门口，当作灯光。舞台虽然简单，可我们很是认真。精心准备了演出服装，每个人还都化了妆。

亚英姐和于瑛姐除了当导演之外，还负责演出人员的服装和化妆相关事宜。

靳宪华当年帅气英俊，身姿挺拔。演出时，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胸前佩戴一朵大红花。

李爽如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有神，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式衣服，扎着布腰带，腰带上别着个长杆烟袋锅。

金兆敏眉目清晰，身穿中式大襟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布，脸上还画了皱纹，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妈妈。

张亚英沉稳大方，出演姐姐。我和邓卫新正值花季。亚英和于瑛姐为我化妆，给我脸上涂了胭脂，并扎上两根小辫子，翘得高高的。不知找谁借来一件小孩子的上衣给我穿上。那短短的衣服刚过腰，穿上紧紧的。于瑛姐说我这样打扮，就更像小孩子了。邓卫新长得瘦瘦小小，不用扮装就像个小妹妹。

演出前，李爽如装扮好之后，还到窑洞里给我们亮了相。只见他旋转着走到大伙面前，猛地一转身，叉着腰，嘴里说着“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那扮相，还真像电影里的武工队队员。

那天，硷畔上热闹非凡，可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我们的节目是最后的压轴戏。在社员许宝贵唱罢婉转的信天游之后，不记得谁说了句，该你们上场了。

我们上场后一字排开，站到场地中央。大家围着即将去参军的小伙儿唱起来：“春风吹开遍地花，吹开了遍地花，小伙参军就要离开家呀。大家来送他呀，全家老少都到齐，人人送他一句知心话呀……”靳宪华精神抖擞地站在场地中央，听着家人分别对他语重心长地说着知心话。

爸爸第一个唱道：“到了部队要听首长的话呀，你可要听话呀，莫把脾气耍呀。艰苦奋斗莫忘本，叫你干啥你就干啥呀”。李爽如扮演的爸爸微微弯着腰，手里拿的烟袋锅配合着眼神和动作，显得威严无比。

妈妈接着对儿子说：“到了部队你别想家呀，你可别想家呀。记住妈的话呀，你可别想家呀。戴上这个针线包，缝缝补补用得着它呀。”金兆敏的声音亲切感人，母送子的万般柔情，都化在了歌声里。

姐姐手拿《雷锋日记》送给小伙，唱道：“我也说句话，雷锋日记弟弟你收下呀，好好学雷锋呀，做个好战士呀。你快把它收下呀，学习雷锋好榜样，灿烂青春献给国家呀。”亚英姐的歌声里充满了姐弟情。

最后轮到我和邓卫新扮演的妹妹，我俩一蹦一跳地来到哥哥面前，说起知心话。我们俏皮地唱道：“哥哥你给俺寄来一朵花呀。”哥哥问妹妹：“你要什么花呀？”妹妹答：“玫瑰牡丹俺们都不要，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

我和邓卫新围着即将参军的哥哥，用那个时代特有的动作舞起来、唱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之中。非常兴奋，早已忘记了紧张。

最后全家人一起唱：“小伙子参军离开了家，千言万语他都记下了。爹爹说的话，妈妈说的话，姐妹们说的话，下定决心当个好兵，早把五好红花寄回家。”

硷畔上歌声阵阵，演出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社员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们也兴奋不已。

回忆陕北

罗志平

明天还要上工，我们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和老乡告别。老乡们已经给我们分好了住处，我和高庆祥同学被分在一个窑洞里。从老乡家到我们的住处需要下一个坡，还要再上一个坡。刚刚下过雪的陕北高原，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雪，我俩当时都有些担心。我们这些在大城市的柏油马路上走惯了的学生，穿的鞋子都是塑料的，底子滑，又没走过山路，不知要在这一段被雪封住的路面上摔几个跟头呢。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了老贫农家的窑洞，正抬眼仔细看面前这段艰苦的路程时，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这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上，在这雪的世界里，在通向我们的窑洞的路上，出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黑乎乎的小路，一个黑影在这条小路的尽头处缓缓移动着。我们赶忙顺着小路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我们新认识的队长在给我们扫雪开路呢！他回头看我们跟上来了，也不说话，只是更加快速地把扫起雪来。雪花在他的身旁飞舞，小路不断向前延伸。我和高庆祥都看呆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都像哑巴一样呆呆地站着，看着喘着粗气、满身雪花的队长，再看着这条黝黑光亮的小路。我俩差点落泪，都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陕北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

磨炼

日子过得真快！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队的四个北京知青都是男生。那天轮到球子（我同学的外号）做饭，陈缓、高庆祥和上山干活。上山前，我们已经商量好，要用空余时间打柴。该休息了，我们便立即分散开来寻找柴。我和陈缓找了几圈，附近光秃秃的黄土坡上没一点柴。最后我们只好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下到半山腰处去找寻。我俩东一点、西一点，好半天才凑了半搂柴。当我们正暗暗叫苦时，忽然看到高庆祥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跑回来，他离我们还有几米远就喊道：“我发现山底下有一根又长又粗的木头，也不知在那里放了多少日子，但是搬了半天也搬不动。”我和陈缓一听，都乐坏了，于是三人就商量着收工以后一起去把它搬上来。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我们三人便踏着陡峭的拦羊小路向山下走去。经过几番寻找，终于找到了木头的所在地。在那满是野草荆棘的一块凹地上，一截树干横躺在那里，就像一具僵尸一样。树皮已经发黑，看样子已经在这里躺了很长时间。我们三人互相看了看，都紧了紧腰带，一起动手连推带拉，鼓着劲

拖着木头走了几步。但是越走越难走，三人累得一屁股坐在树干上，对着这庞然大物喘气。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看着这庞然大物，我们束手无策，刚才的一股高兴劲儿早飞到九霄云外了。“怨不得没人要，看来确实难啃呢！”高庆祥喘着粗气说，“咱们还是用斧子把它砍断再打吧！”在陈缓的提议下，我们终于采取了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当我们砍了近一半的时候，天渐渐黑了，大家都听老乡说过夜走山路危险，有时可能会遇到野兽。想到这儿，我们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这具“僵尸”，并且记住这个地方，准备下次再来收拾它。

没有月光的山路，几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三人加上前来帮忙带路的山里娃樊朋友，四个人在这羊肠小路上慢慢走着，谁也没有心思说话，只顾低头看路，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在这寂静空旷的山谷里，不时传来一两声鸟叫，更增添了莫名其妙的恐怖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幸亏有樊朋友给我们带路，要不然我们非摔到山涧里不可。樊朋友几次劝我们把寻到的仅有的一点柴扔掉，但我们都不肯，都说：“柴在人，在，一定要把它背下去。”老天爷也好像成心和我们作对，今夜的天比哪天都黑。虽然我是1.5的视力，但突然好像变成了0.1，只能勉强看见小路有些发白。陈缓的眼睛近视，我估计他这时可能更看不清了。尽管我们都百倍小心，可突然间，我还是一步踩空，连人带柴一下子掉了下去。我心里一阵紧张，心想这下完了，禁不住失声喊叫了一声。但我并没有摔得太深，到底掉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眼前发生的一切，一个黑影就跟着扑了下来，嘴里喊着我的名字，正好扑到了我的身上。我一眼认出是陈缓，知道他是冒着失足的危险来救我的。

这时，高庆祥、樊朋友也来拉我们了。此刻我才有心考虑所处的境地。原来我是掉在一块有一米宽的土台子上，再往前一尺就是深谷，如果掉下去就真的粉身碎骨了。忽然前面传来了人声，原来是队长领着社员来寻找我们了。感谢乡亲们又一次在危难中帮了我们。队长接过了我们的柴，拉着我们走出了山谷。

当我们走进熟悉的窑洞，顿时感到无比温暖。此时球子为了给我们压惊，特地准备了陕北饸饹。也许是饿极了累坏了，我们吃着香喷喷的饸饹，回想着今天的紧张危险场面，不知不觉间，七斤面做成的饸饹全部进了我们的肚子。

到陕北

随着毛泽东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上下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那时，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革命圣地延安是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向往和憧憬的地方。怀着一腔热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踊跃报名到陕北插队。

1969年的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从北京出发的那天，我没有让父母送我，只是姐姐、姐夫来送我。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送行的人流挤满了站台广场。在一片嘈杂和喧嚣声中，我们怀着既新鲜又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火车只在西安站和铜川站停靠，我们要从铜川改乘卡车到延安，再从延安乘卡车到安塞，最后再到公社大队。一路上，我们几经辗转颠簸，终于在1969年2月3日到达了目的地——安塞砖窑湾公社。当我拖着冻得麻木僵硬的双腿爬下卡车时，看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陕北老乡。这时候，我们那种几经长途颠簸、又冷又累的痛苦心情顿时一扫而光。只见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欢乐的笑容布满了一张张淳朴的脸。小伙子们头系白羊肚手巾，挥动彩旗打着腰鼓，老乡们吹着唢呐唱着《东方红》，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山谷，那热闹场面令远处座座高耸的冰雪群山也沉浸在震天动地的欢乐中。

后来听老乡说，当年欢迎红军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场面。陕北人民用这样淳朴热情的方式欢迎北京知青，令我们十分感动。

一条小路

刚刚放下行李，热情的乡亲们就立刻把我们围了起来，拉进窑里问长问短。由于语言的隔阂，从他们的话里，我们只能听懂大概的意思。一张张慈祥的、憨厚的、幼稚的笑脸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亲切的问候，热情的招待，使我们受宠若惊。

夜深了，窑洞里仍然笑语不断。我们一起吃着乡亲们送来的南瓜子，抽着陈缓同学从北京带来的光荣牌香烟，大家开心地说笑着。虽然当时的我们受到了语言的限制，还听不懂有些陕北方言，但面部表情和手势在不同程度上给我们当了翻译。由于误解陕北方言而不时发出的笑声更增添了这小小窑洞里的活跃气氛，比在北京过年时的全家团聚还热闹。

不知不觉中已是深夜，由于社员